



#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1949—1975

世界知识出版社



##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 认真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代序)

钱其琛

认真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是外交工作的需要，是从事外交工作的全体同志的迫切要求，也是外交战线上的老同志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心愿是，通过深入学习与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更加自觉地加以继承和发扬，进而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开拓创新，把外交工作做得更好。我认为这是对他老人家 91 周年诞辰最有意义的纪念。

大家知道，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袖之一，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家。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的外事工作。建国以后，他以总理的身份兼任外长近 9 年之久，为开创和建立新中国的新型外交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周恩来同志在长途 26 年中，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

建国前夕和初期，周恩来同志与毛主席一起致力于新中国外交基本政策和方针的制订。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重大政策。1952 年第一次使节会议上，他遵循毛主席的某些决策和初步的实践经验，高度概括出“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6 条方针，对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容作了极为精辟深刻的论述。

建国以来所有的重大对外行动，都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实践或直接指挥的。1950 年 2 月，他赴苏协助毛泽东同志谈判，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在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与此有关的外交斗争及其后的停战谈判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他一再据理力争，联合国不得不允许我国特别代表走上国际讲台，有力地控诉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武装侵略。在他领导下，新中国迅速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同一批国家建立了新型的平等的外交关系。所有这一切有力地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主权和尊严，把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一扫而光，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一开始就以独立自主、热爱和平而又不畏强暴的崭新风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朝鲜停战后，周恩来同志敏锐地抓住国际局势相对和缓的时机，经中央决策，大力推行并发展和平政策，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他提出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同印度、缅甸两国总理共同倡议把它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他运用这些原则，为和平解决印支问题和促进亚非团结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新中国也从此开始登上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他亲自“解剖麻雀”，以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为示范，使我国同大部分邻国的边界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先后获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安定了周边环境。从 1956 年底到 1964 年初，他三度出访亚非 28 国，支持它们争取与维护政治、经济独立的斗争，建立与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周恩来同志积极寻求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与发展关系的途径。对日本，他提出“民间先行、以民

促官”的方针，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对英国，他在日内瓦会议后促成了两国间代办级的半建交关系。他同戴高乐特使富尔进行长时间的深入会谈，于1964年初实现了中法建交，打开了我国同西方大国建交的突破口。对美国，周恩来同志也没有把它排除在我推行和平政策的范围之外。在同美国的侵略、干涉政策坚决斗争的同时，周恩来同志一再表示中国愿同美国坐下来谈判，以解决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在他直接领导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既是我国对美进行外交斗争的场所，又是保持双方联系的一种渠道，对以后打开中美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周恩来同志为维护中苏关系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一方面耐心做工作，力求维护团结的大局，另一方面同苏联干涉、控制我国的图谋进行坚决的斗争，特别是顶住了毁合同、撤专家的高压政策，显示了彻底的独立自主立场。从朝鲜停战到1965年，与我建交的国家由建国初期的18个逐步增加到49个，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尤其是广大亚非拉国家把中国视作他们真正的朋友，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同我们并肩战斗，这一切是同周恩来同志的努力不可分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交工作一度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平外交政策被诬蔑为“三降一灭”，出现了一些违反外交政策的破坏行动。周恩来同志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抵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加以补救。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外交工作从1968年起就逐渐恢复正常。

70年代初，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尼克松总统调整对华政策的信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周恩来同志是这一决策的主要参与者和直接实行者。从美国驻波兰大使同我国驻波兰代办的会见到“乒乓外交”，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尼克松跨越时代的握手，都是他亲自安排的。他同尼克松谈判、签订的《上海公报》确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这就为后来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以此为契机，世界上掀起了同我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高潮。到周恩来同志逝世前，与我建交的国家由49个猛增到107个。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得到了恢复。

从以上简要的回顾，我们看到周恩来同志的外交实践可说是新中国外交史的缩影。称周恩来同志为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奠基者，他是当之无愧的。80年代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国外交所开创的新局面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外交思想和论述十分辉煌。其中见诸文字的，例如同外宾的谈话记录、内部报告、文稿和批示等，仅由外交部所保存的就有5000多件。这些论述探讨并回答了新中国外交和战后国际关系中遇到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实际工作，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外交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形成了总体框架。不仅如此，从这些文、电、手稿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也为80年代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提供了重要依据。这里，我想着重指出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以下几个主要点。

（一）明确指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对象是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这就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外交首先碰到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外交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从人类进步的前途看，我们当然要着眼于各国人民、寄希望于人民，但外交工作只能通过发展国家关系

来影响人民；外交关系可以有官方、民间等多种形式，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靠官方。他强调“革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这些论点今天听来已经很熟悉了，但在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尤其是在林彪、“四人帮”所谓的“世界革命”论泛滥的年代，却似中流砥柱，为端正外交工作的基本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把中国革命的根本经验引伸到外交领域，提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他指出，维护得来不易的民族独立，政治上自主而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经济上自立而不依赖外援，这是我们决定外交政策、处理外交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区别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根本所在。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是不能让步的。周恩来同志不论在处理同美国的关系还是同苏联的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性都是十分鲜明的。他在建国前就说过，独立自主的关键“在于不要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建国初期，为了对付美国的威胁，我国同苏联结盟，周恩来同志是赞成的，但他总是强调“不能把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性失掉”，不能盲从、照搬它的政策和经验，不能依赖它的援助，不能没有批评，等等。波匈事件后，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主权国家”，“各国独立和主权也要受到尊重”。他作出了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结论。

（三）从对战后世界主要矛盾和我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中，提出战争与和平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维护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和平政策是我国外交的基本政策，不是一般政策、更不是策略的思想。他指出，尽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根本的，但“当前主要表现出来的是和平与战争的矛盾”、“最突出的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他又指出，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还需要几十年的长期努力，因此“我们需要和平”，“时间越长对人民越有利”。“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一切活动只能是为和平的目的，而不能是其他的任何方针。”对世界大战可能性的问题，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预言“如果新战争已经推迟，它也可能被制止的”。根本原因是“世界和平的力量要大于战争的力量”。他还断言，核武器使大战具有毁灭性，战争发动者是“无利可图”的，因此“核大战不容易打，核武器越多的国家越怕打”。为了把制止大战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他提出了一整套方针、政策，主要包括：支持和平运动、推广和平中立地区，组成最广泛的反战和平统一战线，等等。

（四）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准则。这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集中概括和高度升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要求同和平共处的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规定了相互对等的约束条件，兼顾了当事各方的利益，从而为世界各国实行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战后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冷战共处的对立物，反映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的普遍愿望，因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到70年代末，已有90个国家在同我国发表的文件中承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不得不在接受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同我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苏联也确认这些原则是处理中苏关系的基础，同时广泛适用于国际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在内。这就是历史作出的结论。

（五）提出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正确结合的论点，作为外交工作中处理

本国利益同其他国家的利益的指导思想。他说，我们主张“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国际主义指导下的爱国主义”。又说我们的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加强民族自尊心的爱国主义，不是沙文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周恩来同志特别指出，“我们的国际主义是要各国都独立”。由此出发，他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强调独立自主，相互平等，反对以国际主义之名干涉他国、他党内政；把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作为首要的国际主义义务；主张世界各国不论大小强弱都应享有独立自主的平等权利，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告诫我们既要珍视自己的独立、主权，也要尊重别人的独立、主权，永远不称霸，等等。

（六）重视国际经济关系，主张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以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经济繁荣。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发展经济“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靠国际合作”；“自力更生建设独立经济并不排除和拒绝平等贸易、互通有无、技术进口、相互援助”，“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更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他还指出，“我们应该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和优点”，包括“资本主义生产上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敢于这样做“就是有自信心的、也是有自尊心的，也是能够自强的民族”。在国际合作中，他强调平等互利，不能只利于己，不利于人；互通有无，有来有往；“目的就是求得人类繁荣”，“大家可以共同发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缺乏远见，不仅损害别人，对自己也是不利的。他在1964年亲自提出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以上可以说是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先声。

（七）在国际关系中提倡“求同存异”，作为处理各种矛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方法。他说，“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唯一致起来”，为了在地球上一起生存，就“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去“找共同点”。正是周恩来同志找到了这样的共同点，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可说是“求同存异”的战略意义。至于在具体的外交谈判中，为了达成协议，观点上的必要妥协、利益上的互谅互让，都需要求同存异的愿望和艺术。所谓基本方法就是这个意思。周恩来同志善于在尖锐的矛盾中求同，善于在适当的条件下存异，他以这种高超的外交艺术被誉为“处理外交难题的能手”。

（八）从传统哲学中吸取营养，提出一整套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外交策略和外交艺术。例如，外交行动要“见机而作”，但“不能心急”，要“守如处子，动如脱兔”，这是讲有了机会决不放过，抓住时机的重要性。又如，在发生矛盾时要“恪守后发制人的原则”，“决不开第一枪”，“人家对我们不好，可是我们决不先对人家不好”，这是讲要在政治上争取主动，不搞突然袭击，不求形式上的先声夺人。再如，“来而不往非礼也”，你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进行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为懦弱可欺”，这是讲忍耐要有限度，不可一味退让。还有“针锋相对”、“退避三舍”、“弯弓不发”、“有备无患”、“细水长流”、“见缝插针”，等等，都是周恩来同志经常运用的外交艺术，里面充满着辩证法的思想，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需要指出的是，贯穿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各个方面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可以说是一种品格，一种作风，归根到底这是一条思想路线。正如他自己所说，“应该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精神，尊重客观

事实，服从真理，把自己置于客观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他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总是从国际形势和我国实际的需要和可能提出外交工作的目标和任务。他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勇于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他既坚决执行中央的集体决策，又不是机械地用搬，善于把基本原则落实为切实可行的具体政策和行动方案。在具体的外交行动中，他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善于作出必要的妥协，以推动问题的解决，达到预定的目标。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充分掌握情况，特别是第一手材料，然后作出客观的判断。周恩来同志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常常比较正确，他的外交实践往往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提出的主张比较符合实际。

周恩来同志的外交风格独具特色，这是举世公认的。所谓外交风格就是一个人的思想、品德、作风在外交实践中的形象体现，并往往被视作一个国家精神风貌的反映。周恩来同志多次强调新中国必须同旧传统决裂，“在新的外交风格上树立一面旗帜”。他本人的外交风格就是这样一面光辉的旗帜。不少老同志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耳提面命，对此有许多亲身感受，从不同角度作过概括。

首先，周恩来同志在重大外交问题上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是十分鲜明的，决不会使旁人对中国的立场有丝毫误解。但在阐明这些立场时，则总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从不强加于人。对方一时接受不了，就耐心等待。正如他所说，“只要有真理，今天听不进去，将来想起来还可以起作用。”例如，尼克松访华谈到越南问题时说，一旦美国退出，某些地区就可能出现“真空”。对此，周恩来同志反问：美国退出中国后，出现“真空”了吗？还不是中国人民填补了。英国退出美洲大陆时出现“真空”了吗？还不是美国人民填补了，尼克松听后唯有连连点头。这种是非分明、以理服人的态度为新中国和他本人赢得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尊敬和友谊。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就有人这样对他说：“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包括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同你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一位记者发现，在周恩来面前“任何不信任的感觉或者对他还有些怀疑的判断，几乎都会烟消云散”。

其次，周恩来同志在外交场合，无论待人接物还是言谈举止，总是那么落落大方，不卑不亢。朋友们觉得他可敬可亲，乐意接近。而那些敌视我国而又傲慢自负者如杜勒斯之流则感到他凛然不可侵犯。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者，他特别注意尊重中小国家的朋友，强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种平等待人的精神在国际上树立了新中国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处的崇高形象，被誉作“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吴努总理曾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在周恩来访问缅甸以后，大大消除了缅甸人民的这种恐惧”，高度评价了这种风度所起的作用。

第三，实事求是、说话算数是周恩来同志外交风格的又一重要表现。他经常提醒我们：向客人介绍情况“不要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要放手让客人看我们好的、中间的、落后的三方面现象，“这是客观存在，让他们看了作出结论”；不要只听顺耳的话，“坏话”也要听，“可以引起我们警惕，起推动作用”。根据这样的精神，他在处理涉外问题时，总是强调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周恩来同志坚持“说话算数”，做不到的事决不说，说过的话一定要做到。他曾特意为田中首相题辞：“言必行，行

必果”。正如基辛格以其亲身体会在其回忆录中所写：“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是可以认真与之打交道的。周恩来同志遵约守信、说话算数的风格，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份量，使朋友感到可以信赖，使对手不敢掉以轻心。

第四，交友以诚，肝胆相照，设身处地体谅朋友的困难，帮助解决问题。这是周恩来同志外交风格的又一突出表现。1964年访问加纳前夕，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加纳国内局势混乱，是否如期往访成了一个问题。他坚持“愈是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愈是要去”。埃塞俄比亚迫于外国的压力，打算在首都以外的地方接待周恩来同志，这是失礼的安排。他却说“没有关系，外国对他们有压力，我们应该谅解他们”。中日建交前，日本的一位政治家来访，在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时介绍了回国后向新闻界谈话的口径。周恩来同志听后表示：不要大说中国的好话，要说得含蓄一点，这样对你们党内、党外、人民之间、对美对苏关系上都有好处。一席话使得对方深为感动，对我陪同人员表示，从政几十年，从未遇见像周总理这样为他人着想的人。他还说，“没有一个外国政治家像周恩来总理那样在日本各阶层人民中有那么多朋友，得到那么多人的尊重。”有人称赞周恩来同志不但能广交朋友，而且还能把敌手争取过来，在他逝世后全世界都向他致敬，没有听列人唱反调，这确是罕见的事。

最后，周恩来同志在对外活动中虚心好学，把各方面的来宾当作“送上门来的老师”，了解情况，切磋问题，以至有些外国朋友惊奇地发现，他们对他们国家的了解比他们自己还多。

从以上这些事例我们可以体会到，周恩来同志身上那种神奇的魅力、吸引力，不是别的，就是他这一整套外交风格或外交艺术所发生的作用。它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仅为他本人，而且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赢得了尊敬。

同志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在此期间，国际局势有了很多新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出现了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到缓和的转折性变化。我们在这样的时间来学习、研究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包括他的外交风格以及他在外交部身体力行树立起来的优良作风，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学习与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继承与发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新形势下开拓和创新，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继承是开拓的基础，开拓是继承的目的。80年代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在继承中开拓创新所取得的。这个过程还将继续下去。我们要结合新形势，着重学习、研究周恩来同志关于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思想，为促进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而努力。我们还要着力发扬他倡导并培育的实事求是、积极进取、廉洁奉公、严守纪律、谦虚谨慎、大公无私的优良作风，把我们的外交队伍建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敢于创新，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

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是一座极其丰富的宝库，不仅值得长期为外交事业奉献力量的老同志，而且也值得在外交战线上逐渐成长起来的青年同志去作深入的发掘。这次研讨会，不少老同志和部内部属各单位撰写了50多篇论文或回忆文章，把许多材料集中了起来，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这些成果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希望以此为起点，大家共同努力，把这项工

作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本文是作者在外支部“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讨会”上的开幕词）

## 1949年

10月1日把同日毛泽东主席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通知各国政府。

上午11时，和宋庆龄、刘少奇、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前往火车站欢迎以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西蒙诺夫为副团长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代表团前来中国参加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

10月3日电复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对苏联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我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表示热忱欢迎。

下午4时，接见原苏联驻北平总领事谢·列·齐赫文斯基（10月4日，苏联外交部任命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

10月10日下午，赴火车站欢迎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抵京。

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10月16日下午5时，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递交国书。

10月20日晚7时，出席毛泽东主席为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举行的宴会。

晚10时，前往火车站为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离京赴任送行。

11月7日上午，应邀出席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为庆祝十月革命32周年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

下午5时，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32周年。

11月10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出：毛泽东主席准备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和进行访问。访问期间还打算提出签订中苏条约问题。

11月15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声明“山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完全无权代表中国，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该“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11月16日下午，设宴招待世界工联执行局委员和出席亚澳工会会议的各国代表。在宴会上致欢迎词时说，世界工联的领袖们和各国工人代表来到中国，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22年前国际朋友曾到过中国，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使我们隔绝起来。今天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胜利，使我们得以重行聚会，因此我们对于国际友人的到来感到分外的高兴。

11月29日就蒋介石军队逃往越南等地发表声明，不管战败了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逃到什么地方，我国政府都保有权利过问这一事实，而容留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的任何国家的政府必须对此事实负责，并承担一切后果。

12月3日发表关于中国、中央两航公司留港资财问题的声明。

12月11日晚上，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和来宾，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及全国人民向到会的各国代表和各国来宾致欢迎词时说：中国革命经过30年来长期奋斗的过程，每当革命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全世界有我们的朋友，首先有苏联鼓舞我们，还有各国的革命运动鼓舞我们。现在情况倒转过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又正鼓舞着世界上的各个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人民，也鼓舞着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

12月21日下午，应邀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为庆祝斯大林元帅70寿辰举行的鸡尾酒会。

## 1950年

1月4日电复印度外交部长尼赫鲁，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印度政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望印度政府派遣代表前来北京，就此项问题进行谈判。（印度外交部长尼赫鲁曾于上月30日致函周恩来外交部长，称印度政府欲与我建立邦交。随后，印度前驻南京国民党政府大使馆秘书雁谒森向我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处长黄华写信，称印度政府业已声明，撤销其对国民党政府之承认。）

1月8日致电联合国，要求安理会开除非法的国民党代表。

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柯托夫中将。

1月9日下午6时，接见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魏斯柯普夫博士。

1月10日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苏联，参加中苏会谈。

1月19日通知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和秘书长赖伊，中国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大会首席代表。

1月20日抵达莫斯科。在雅罗斯拉夫火车站受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等及各国使节的欢迎，并发表演说。

1月21日和毛泽东主席等出席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悼念列宁逝世26周年纪念大会。

1月22日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

1月27日在莫斯科谒列宁墓，并献花圈。

2月6日和毛泽东主席参观苏联第二十三飞机制造厂。

应邀出席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的宴请。

2月7日和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参观斯大林汽车工厂。

2月9日在克里姆林宫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为毛泽东主席举行的招待会。

2月10日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

2月13日晚上和毛泽东主席等在莫斯科国立实验大戏院观看芭蕾舞《天鹅湖》。

2月14日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同时签署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在签字仪式上讲话时指出，中苏这些条约和协定的意义，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这些条约和协定，将使中国人民感到自己是不孤立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晚9时，和毛泽东主席出席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夫妇为庆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举行的盛大招待会。苏联党政领导人斯大林、什维尔尼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500余名来宾应邀出席。招待会至午夜结束。

2月16日在克里姆林宫和毛泽东主席出席斯大林举行的宴会。

2月17日和毛泽东主席等乘火车离莫斯科回国。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等前往车站送行。

2月20日和毛泽东主席等抵达西伯利亚城市斯维德洛夫斯克，逗留数小时，参观了一些工厂和乌拉尔地质博物馆。

2月21日和毛泽东主席等抵达鄂木斯克，逗留数小时，游览城市，参观

机器工具制造厂。

晚上，前往国家歌舞剧院观看《伊戈尔王子》的演出。

2月22日和毛泽东主席及其随员们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逗留，参观联合收割机制造厂。

晚上，出席俄罗斯歌曲合唱队的音乐会。

2月24日和毛泽东主席及其随员们在伊尔库次克逗留数小时，游览城市，了解少年富工作情况，并参观茶叶包装工厂。

2月25日和毛泽东主席抵达赤塔，逗留数小时，参观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的一个选区和一所中学。

2月26日和毛泽东主席一行经由奥特波尔车站离开苏联时致电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对从莫斯科出发以来，沿途备受苏联同志的盛情招待致谢，并祝两国永远的友谊和合作。

3月4日上午10时，和毛泽东主席及其一行回到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等前往车站迎接。

3月10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鲁登科递交国书。

3月12日下午5时30分，在外交部接见朝鲜首任驻华大使李周渊。

3月15日下午，在外交部会见匈牙利驻华公使夏法朗柯。

3月18日就美国国务卿艾奇逊3月15日关于“美国对亚洲的政策”的演说发表谈话说：可笑的恫吓早已过时了。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不应由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例如艾奇逊之流，来加以干涉！

3月23日晚上，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魏斯柯普夫博士。

3月27日晚11时，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

3月28日晚11时30分，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

3月29日致电国际电讯联盟秘书长艾奈斯特，正式通知，中国政府业已任命邮电部电信总局局长李强为参加国际电信联盟首席代表。本年4月1日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广播会议不能容许中国国民党的所谓“代表”参加。

3月30日晚11时30分，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匈牙利驻华公使夏法朗柯。

4月4日下午，应邀出席匈牙利驻华公使夏法朗柯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4月28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通知我派冀朝鼎代表出席将在曼谷召开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并指出国民党的非法代表没有参加该委员会会议的资格，必须从该委员会驱逐出去。

5月5日晚上，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为苏联青年代表团举行的欢迎酒会，并在酒会上致欢迎词。

5月9日晚8时，应邀出席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魏斯柯普夫为庆祝捷克斯洛伐克解放五周年举行的宴会。

5月12日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陶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戚任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鲍台特及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主任斯渥波达，通知他们说：中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现已完全没有资格参加各该组织，必须将这些非法代表从各该组织的各项机构和会议中驱逐出去。

5月15日发表声明指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擅释日本战犯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利益，我政府完全赞同苏联向美所提严正要求。

5月17日下午5时30分，在外交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潘尼迦大使递交了国书副本和颂词各一份。

5月20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递交国书。

5月27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宴请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

5月30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通知他中国政府已任命孟用潜为出席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的代表，并指出联合国及所属各组织除万国邮政联盟外，迄今仍容留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是不合理的。

6月7日下午，在外交部接见波兰首任驻华大使布尔金。

6月8日下午2时，在外交部接见瑞典首任驻华大使阿马斯顿；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6月14日就中捷贸易协定的签订，回答捷克斯洛代克通讯社和捷红色权利报驻华特派员万纳所提问题时指出，中捷贸易协定的签订是中捷两国友好经济合作的重要开端，它对于中捷两国的经济建设和促进中国工业化是有帮助的，对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是一个大的贡献。

6月16日下午，应邀出席瑞典驻华大使阿马斯顿为庆祝瑞典国庆和国王93岁寿辰举行的招待会。

6月20日下午，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外交使团大使衔团长柯尼希，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6月24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外交使团大使衔团长柯尼希递交国书。

6月28日就美国总统杜鲁门27日发表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而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的这一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

7月4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宴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外交使团团长柯尼希及该使团全体外交官员。

7月6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发表重要声明指出，联合国安理会于6月27日在美国政府指使和操纵下所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大大破坏了联合国宪章。

7月10日下午，宴请丹麦驻华公使穆克。

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宴请蒙古驻华大使贾尔卡赛汗。

7月11日下午，应邀出席蒙古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宴会。

7月17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匈牙利公使夏法朗柯就任大使后递交国书。

7月20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欢宴匈牙利首任驻华大使夏法朗柯。

7月22日下午，应邀出席波兰驻华大使布尔金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3月1日下午6时，在外交部接见缅甸首任驻华大使吴敏登，商谈递交国书事宜。

8月7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受缅甸首任驻华大使吴敏登递交国书。

8月15日下午，应邀出席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为庆祝朝鲜解放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20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和秘书长赖伊，斥责美国制造朝鲜事件，侵略朝鲜和台湾，企图以此扩大战争，并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支持苏联和平调处朝鲜问题提案，同时坚决反对美空军对朝鲜的野蛮轰炸。

8月23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波兰驻华大使布尔金。

下午，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等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为庆祝罗解放六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24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和秘书长赖伊，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的罪行。

8月27日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美国飞机侵入我国领土上空，扫射我建筑物、车站、车辆和我国人民以致伤亡等事，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美国政府惩办美国空军和赔偿一切损失。

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和秘书长赖伊，要求制裁美国空军侵入我国领土的严重罪行，并应使美国完全撤退其在朝鲜的侵略军队。

下午4时，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蒙古驻华大使贾尔卡赛汗谈移交内蒙奸细德王和李守信事。（注：德王系伪蒙疆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系伪蒙古军总司令。）

9月9日下午5时，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谈关于中国参加联合国问题时指出：关于中国参加联合国问题，是很简单的，其中一个决定的因素，就是美国阻挠。因为美国能够操纵多数，如果美国政府不加阻挠，即能通过。所以问题的焦点在美国政府。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参加联合国，那是一件无可争辩的事情。印度政府把这个问题提到美国面前，的确找着了对象。至于美国驻印度大使的意见，只是一种借口而已。恰巧是美国先攻击了中国，然后中国才攻击美国。这是双方的事情。谁占领了台湾呢？是美国第七舰队和他的空军。当然中国人民要反对，中国政府也要反对。谁的飞机到鸭绿江我国境内来扫杀我国人民和毁坏我国财产呢？是美国空军。当然中国政府要反对。不这样做，中国政府就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因此，要中国人民不反对美国，美国政府应改变其侵略政策，但又几乎是不可能的，故责任全在美国。中国有句佛语“解铃还须系铃人”，关键仍在美国。美国政府的行动就不能使我们不开口，几乎美国政府每一天在世界上做的事都是不能使爱好和平的人不说话。问题不是我们说得太多，而是说得太少。因为我们忙于国内事务，我国对国际事务就说得少些，但关于中国的事是不能不开口的。

9月11日出席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由文化部主办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展览会”开幕式。

9月16日致电联合国，表示在安理会讨论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时，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

9月21日下午5时30分，在中南海接见波兰驻华大使布尔金，谈中波贸易、中波合营轮船公司、中波邮电协定等问题。

9月27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等，控诉美国侵略朝鲜军舰在成山角附近炮轰并非法盘查我商船“安海二十一号”，要求将此列入联大议程并邀我出席讨论。

9月28日晚7时，在外交部接见保加利亚新任驻华大使彼得科夫时说，你们出了季米特洛夫同志，国虽小，却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物。季米特洛夫同

志在共产国际工作时对中国帮助很多，他研究中国问题，1939年到1940年我常见到他，他对中国人民革命问题很熟悉，很关心，他的文章在中国流传很广。最近他的选集已在这里出版了。去年，中国青年代表团到过保加利亚，祭过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陵墓。

9月30日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互换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并于4月11日经中苏两国批准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批准书。同时交换了其他三项协定的批准书。

出席毛泽东主席举行的盛大国庆宴会，各国驻华使节应邀赴宴。

10月1日发表《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中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时指出：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3日凌晨1时，在中南海西花厅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并告：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前天收到大使阁下转来尼赫鲁总理的来函。尼赫鲁总理所提的问题中，有一个是比较紧急的，那就是朝鲜问题。美国军队正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

10月初去苏联克里米亚会见斯大林谈我党对朝鲜战争的意见和看法，并告中国决定以志愿军形式出兵朝鲜抗击美国侵略者。

10月24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通知中国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七人为特派代表的助理人员，共九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国政府所提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

10月26日再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控诉美机不断侵犯我领空，指出美国扩大战争的罪行继续向我东北发展，要求立即撤退侵朝美军，熄灭战争扩大的火焰。

10月28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控诉美机侵犯我山东沿海，要求立即撤退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的武装。

11月7日下午4时，应邀出席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为庆祝十月革命33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1月11日电复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拒绝讨论由美国操纵的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特别报告。但建议：鉴于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和侵略台湾这两个问题密切联系着，安理会应将这两个问题合并讨论，以便中国代表出席安理会讨论“控诉武装侵略”时，得以同时提出控诉武装干涉朝鲜的问题。

11月26日电复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中国政府已任命出席安理会特派代表伍修权、顾问乔冠华及其他助理人员兼任出席政治及安全委员会，参加讨论对美国侵略中国控诉案之会议的代表、顾问及助理人员。

12月4日发表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声明指出，我必须参加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美备忘录抹杀中国人民抗日奋战的基本利益。

12月22日就联大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发表声明，声明称：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我国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12月25日下午4时10分，在外交部接见瑞士公使任佐立，商谈递交国

书事宜。